

# 执政党超越政权更迭周期率的理论思考\*

陈正群

(盐城工学院 社会科学系,江苏 盐城 224003)

**摘要** 执政党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项特殊的政治过程。通过对执政党的兴衰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其成功与失败的内在原因。任何一个执政党要想长期执政,必须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反映社会发展的愿望,改造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政党结构,一句话,变革与创新是执政党超越政权更迭周期率的唯一途径。

**关键词** 执政党;政权更迭周期率

中图分类号:D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X(2003)03-0005-03

自从政党作为政治实体进入政治生活,在世界各国的政治生活中,我们会注意到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即国家政权在不同政党之间不断易手、政党轮流坐庄。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或者多党联合执政,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时间不一,有的长则数十年,短则几个月,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永久地维持执政地位,即使像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这些具有“一党独大”政治传统的国家也同样遭受过在野的命运。1991年,执政长达74年的社会主义政党苏维埃共产党在俄罗斯民主化过程中轰然倒塌,它也像西方国家政党一样没有逃脱被人民抛弃的厄运。从理论上讲,西方政党兴衰与苏联及东欧共产党的命运应该说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制度秩序内的游戏规则失败者,而后者则宣布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政治制度、一种政治理想的失败与破灭,但是,撇开本质单就现象而言,这些政党组织都没有超越政权更迭周期率这个怪圈,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如何走出这个历史怪圈、超越历史,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下面,我们对执政党的兴衰进行对比分析,比较它们成功与失败的内在原因,为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 一、苏东共产党的垮台:政权更迭的反例

苏联及东欧共产党的垮台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背景,从政治学的角度观之,其根本原因是与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分不开的,而其基本原则则在于僵化的政治体制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为什么这些国家最终在这一点上没有找到正确答案?“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理论障碍,即是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sup>[1]</sup>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列宁提出两种过渡战略:一是军事共产主义,二是新经济政策。列宁逝世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随着城乡

资本主义的活跃,斯大林认为退却已经到了终点,该是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时候了。尽管布哈林等人提出与斯大林相左的意见,但是,斯大林的观点还是最终赢得了胜利,他否定了布哈林提出的“我们恰恰是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等主张,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是共同规律,并且通过强制手段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推广,成为取得政权的各国共产党人的经典。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出现危机。在匈牙利,纳吉在危机时刻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他力图纠正匈牙利照搬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夸大阶级斗争和滥用无产阶级专政等错误,强调要发展人民民主,应该遵循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但是,纳吉的主张触到了苏联模式的要害,最终未能付诸实践。

斯大林时期长期积累的矛盾,使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不得不在斯大林逝世后着手进行改革。在政治上,首先削弱内务部门的超越法律的权力,强调加强集体领导。在经济上,改革集体农庄制度,使集体农庄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同时,改革经济管理制度,改“条条”管理形式为“块块”管理,建立经济行政区,扩大地方在经济管理中的权力等。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根本上说只是在原有模式的框架内搞修补,并没有认识到要改变原有体制的模式。

1968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著名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布拉格之春”实际上反对苏联模式,尝试用另一种社会主义来解决苏联模式造成的危机。1968年4月,中央全会通过了《行动纲领》,提出了以下改革设想。政治方面:一是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克服以党代政的弊端;二是发扬党内民主;三是发扬社会民主;四是强调民族阵线的作用;五是转变工会的中心任务。在经济方面:一是扩大企业权限;二是成立工厂委员会;三是提倡生产和贸易组织可以搞多种多样的结构;四是取消外贸垄断;五是农业合作社将完全独立进行经营。这个行动纲领的突出之处是触及到共产党领导的方式,提出了要改变以党代政的传统

\* 收稿日期:2003-03-21

作者简介:陈正群(1968-),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工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万方数据

体制。莫斯科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背叛,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于是,1968年8月20日,苏联出兵镇压了“布拉格之春”。

1989年冬,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易帜以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前领导人日夫科夫对社会主义在本国的失败有过如下的反省:“最使我失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sup>[2] p.115</sup>

从苏东改革失败的历史,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改革的难题:关键是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成败的关键,解决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的出路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斯大林模式的政治体制是在列宁时期奠基,在斯大林时期最终形成和强化的。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革命胜利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维埃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统一的原则,共产党通过掌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多数实现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到1920年形成了俄共一党独掌政权的局面,出现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局面。列宁发现了这个弊端之后,力主党政分开,发扬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但列宁最终没有完成这一任务。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进一步强化并且完成了构建苏联政治体制的历史任务,逐步形成了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斯大林加强以党代政,国家权力过度集中于党,党内权力又过度集中于党中央个别领导人。实际上,“最高苏维埃变成‘橡皮图章’”,斯大林体制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经济体制实行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在这个时期的巨大成就都是在这种过度集中的体制下取得的,而这个时期在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重大失误主要也是源于这种体制。虽然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各届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政治体制作出了变革与调整,但都没有改革权力过度集中这一基本特征。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时,苏联面临的是一个非变革不可的严峻形势。正是这种过度集权的以党代政领导体制,造成了以人治代法治,有法不依,长官意志盛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与终身制;党和国家缺乏有效的人民监督体制。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很大的压制和破坏。这使得当时苏联社会孕育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兴利除弊,使社会主义制度经过自我完善,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已成为苏联历史发展的必然。“除了改革,没有出路。”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导致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初是从经济体制方面开始的,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未摆脱过去某些僵化的观念的影响,使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效,遇到障碍后,戈尔巴乔夫不得已将改革的重点转向了政治体制。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从“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进一步发展到“权力中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把改革的矛头指向政治体制的核心——党的领导,并从批判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进一步向否定这种社会制度倾斜,改革目标也从原来的“完善社会主义”转变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决定放弃领导核心作用,转向多党平等竞选。3月,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取消宪法第6条关于苏共领导作用的规定,苏共实现了由“先锋队”向“议会党”的转变。1991年8月,在种种压力之下,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自行解散”,12月苏联解体。

## 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复兴 政权更迭的正例

20世纪末与苏东共产党命运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国家的转型与复兴。从1996年至1998年,欧盟15国中有13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执政;“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闹话题。

社会民主主义实现复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因条件来看:一方面是在80年代新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在里根—撒切尔时期,执政的保守党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牺牲公正来换取效率,在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富人收入的同时,侵犯了低收入者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和大规模失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另一方面是出现了调节市场的新需求,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使人们认识到,市场的发展确实需要一定形式的理性调节,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调节者和仲裁者是不可或缺的。从内因来看:在战后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里,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凯歌行进,建立了福利国家,然而,最近20年间,在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社会结构变化等新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下,社会民主主义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当初奠定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成功基础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改变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范式及其社会基础被结构性地削弱了,由此出现了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作为对全球化时代种种挑战的回应,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变化了的条件下不得不以变革求生存,纷纷进行改革和创新,力图通过积极的理论革新和政策调整来摆脱困境,探索新的道路。它们的改革尝试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功,因此,可以说,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归根结底是社会民主党改革和创新的结果。

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和创新中,英国工党走在前列。从80年代末开始,长期在野的工党就着手探索一条摆脱困境、重新崛起的新路。1994年布莱尔任领袖后,在建设“新工党”的口号下,对工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使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传统政党转变为以争取上台执政为主要奋斗目标的现代政党。布莱尔领导下的工党转型过程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1)首先对“社会主义”和对工党本身重新定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修改党章第四条,放弃了实现公有制的社会目标,把社会主义目标规定为社会公正、充满活力的混合经济、开放的民主社会和健康的环境等。(2)其次,确定一种新的政治思维框架和新的行动方针,同时创造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词汇——“第三条道路”。吉登斯宣布,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要超越左右两分的传统政治思维框架,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束缚,放弃老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与新右派的新自由主义理念中那些无效的因素,保留其积极的、富有生命力和创新潜能的因素,走非左非右亦非中间的道路。在“超越左右”的口号下,新工党试图在抛弃传统左翼的国家干预主义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模式的弊端的同时,将两者的积极方面结合起来,在坚持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吸收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积极成分,既让经济充满活力,又维持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也就是说,它要在日益衰落的福利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努

力寻找一条中间路线。

### 三、变革求新是执政党超越政权更迭周期率的唯一途径

客观地讲,苏东共产党的垮台、社会主义事业在全球范围遭受挫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在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时候,它们在力量上似乎占了上风,国际形势对仅存的社会主义中国形成包围态势;另一方面,国内有些人开始怀疑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有的人甚至产生中国共产党维持政权不会太久的悲观论调,这些人从内部动摇了社会主义的根基。但是,我们从反面看,苏东共产党的命运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又是幸运的,因为苏东共产党的失败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苏东共产党失败的内在原因,并在执政党建设中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可能、也有能力长期维持执政党地位。

从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任何一个政党要想长期执政,必须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体现社会发展的愿望,改革不切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改造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政党结构。一句话,变革与创新是执政党超越政权更迭周期率的唯一途径。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苏东共产党在其执政期间不是没有进行改革,但是,为什么它们就没有取得与西欧社会民主党相同的改革成果呢?因此,这里就存在着一个执政党变革求新的原则问题,如果背离了这些原则,其结局和命运都会与最初的愿望背道而驰。这也是执政党规律的重要内容。

#### 第一、执政党建设必须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宗旨

社会主义的国家必须要由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来执政,实现党的领导,这是一条不可移易的马克思主义定则。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改革2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确实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现代化事业不可替代的坚强领导核心,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党的领导地位。正因为党在现代化建设中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所以,为了更好地领导现代化建设,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和领导制度都能适应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和领导制度都能适应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改善党的领导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又是为了有效的加强党的领导,离开加强党的领导这个目标和方向,改善党的领导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总之,加强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必须始终牢牢地把握它们的辩证统一。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正是因为它们放弃了党的领导,它们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搞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结果必然削弱党的领导地位,并最终葬送社会主义的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在这方面有明确的态度,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以及执政党建设,其根本的目标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恰恰相反,这些改革措施正是为加强党的领导,使党能够更好地行使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使命。

#### 第二、执政党必须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真正

履行人民利益的代表职能

从政治学的一般理论上讲,执政党之所以为执政党,人民之所以选择这个党而放弃选择其他政党,关键的一条是,人民认为这个党能够集中反映全体民众的意志,真正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通过该党的执政,人民的各方面利益都能有所保障,因此,人民选择执政党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维护与实现人民的利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实行多党竞争的选举制度,因此,那些谋求执政的政党组织千方百计地迎合选民的口味,以各种政治许诺争取选票。虽然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和政党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性质上的差异,但是,人民对执政党的决定作用是一致的。当人民对共产党失去信任的时候,共产党的命运与西方国家的在野党不会有什么区别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历史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人民利益的代表”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也不是虚假的政治承诺,中国共产党必须将意识形态的东西转变为确确实实的行动,让人民从真正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无可替代的政治地位。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改造“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以革命的胜利成果实现了人民利益的根本需求,满足了人民对正义和进步的追求,但是,改革开放后,随着政党性质转型的完成,中国共产党以革命的方式来代表人民利益,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了,因为这时人民的利益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希望在革命胜利之后能够实现经济富裕、政治文明和文化发达,所以,执政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求,以执政而不是革命业绩来赢得人民的支持,这是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原则。

#### 第三、执政党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在任何一个国家,衡量执政党水平最重要的标准就是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不管这个政党先进性如何,也不管它设计的未来社会蓝图如何的美好,经济建设搞不上去,人民群众照样会放弃对该党的信任。90年代前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时候,更要把提高领导经济能力作为一个主要目标,因为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国内因素,即履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必须通过发展经济实现;二是国际因素,即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砝码。因此,执政党建设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提高执政党经济发展的水平与能力。邓小平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党全国的中心任务,党必须始终抓住这个中心不动摇,党委要集中精力,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协力,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工作,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更要加强和改善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要对经济的发展和改革进行宏观决策,努力提高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和重大方针政策的能力和水平。

#### 第四、执政党建设必须把民主作为未来发展的政治目标,按照现代政党的规律构建新型社会主义政党

苏联共产党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化程度太低,其主要表现为:党凌驾于宪法之上,党权代替法权,权力集中于党,党权集中于个人,个人专制、领袖崇拜作风盛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组织的权力缺(下转第58页)